

蔡辰梅 著

THE CRISIS OF SELF-IDENTITY
IN TEACHERS' PROFESSIONAL LIFE

教师职业生活中的 自我认同危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蔡辰梅 著

THE CRISIS OF SELF-IDENTITY
IN TEACHERS' PROFESSIONAL LIFE

教师职业生活中的
自我认同危机

藏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教师职业生活中的自我认同危机 / 蔡辰梅著.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4

ISBN 978 - 7 - 5161 - 7884 - 3

I. ①教… II. ①蔡… III. ①教师—职业道德—研究
IV. ①G451.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63165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宋燕鹏

特约编辑 孔 岳

责任校对 闫 萃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6

插 页 2

字 数 268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我是谁？”

这是一个人类千百年来苦苦追问却难有答案的问题。然而，正是在不弃不离的追问中，人类获得了精神生命的不断觉醒和成长。“知其不可而为之”，对几乎没有答案的问题的孜孜求索，彰显着人类精神生命厚重的悲剧之美。而对这一问题的轻视和逃避，则透射出人们在精神上的平庸与可悲。

此刻，扪心自问，我们是在执着追问还是默然逃避？

作为知识分子的教师，其对“我是谁”的追问，具有更为特殊的意义。因为，他们担当着对处于成长中的人类个体进行精神引领的特殊使命。失去对内在生命价值和意义的深切追问，教师便很难在精神上确立具有深度和高度的自我，便有可能处于一种精神世界的残缺状态。如此，也就很难真正承担并完成作为教师的职责和使命。因为，当自我的精神世界一片混沌的时候，我们不可能为他人的内心世界送去光明。于是，对于教师群体而言，“我是谁”的追问，更具体地演绎为“我是教师，我是谁”的特定追问。而这是一个内含了更为强烈的价值诉求的追问。

然而，在现实的教育情境中，教师们是否在追问？他们在如何追问又在如何做出自己的回答呢？

我怀揣疑问，走向田野。

前　　言

在当前的教育中，教师的生存状态问题日益引发人们的关注。而在对教师生存的观照中，自我认同危机作为一个内部的根源性问题凸显了出来。发现和揭示教师在其职业生活中所遭遇的自我认同危机，成为了解和改善其生存质量的重要切入点。本研究运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参与观察、深度访谈、文本分析等具体方法的使用，对教师职业生活中的自我认同危机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通过现场研究及数据资料分析，本研究发现，教师的自我认同危机主要表现为三个层面上的次认同危机，即以个体内在“道德框架”为参照的价值认同危机、与学校空间中的制度规约相冲突的专业认同危机和在社会结构转型中的角色认同危机。

教师的价值认同危机主要表现为在职业生活中价值认同与价值选择的背离，其实质是教师在存在性价值和功利性价值之间的选择困境。在价值选择的过程中，教师内在“道德框架”的迷失，以及外在因素影响下道德空间的重构造成了教师的价值认同危机。教师的价值认同危机凸显教师自我认同的伦理特质，即教师在建立自我认同的过程中，伦理层面认同的建立具有核心意义。但是，教师当下所处的受到工具理性和市场逻辑深刻影响的职业生活方式与教师自我认同的伦理特质之间存在着深层矛盾，使教师价值认同的实现面临困境。

教师的专业认同危机主要表现为制度规约与教师专业自主之间的冲突及教师的专业认同与专业行为选择之间的背离。造成这种背离的主要原因是各种制度缺陷对教师专业自主的抑制及教师个体在制度规约下“真实性理想”的缺失和降为“代理人”的存在。教师的专业认同危机显示出教师的自我认同具有明显的专业取向，即教师个体在专业领域中的自我实现对其自我认同的建立具有实质意义。

但是，现实中教师自我认同的专业取向与教师自由缺失的专业生活方式之间的内在矛盾造成教师的专业认同危机。

教师的角色认同危机主要表现为时间维度上角色传承的断裂，以及在社会空间维度中由于“去圣化”的角色需求和角色选择取向而遭遇的双向角色认同危机；即源自群体之外的社会认同危机和源自群体之内的集体认同危机。教师的角色认同危机反映出教师的自我认同具有一种角色面向，即作为特定社会角色的认同的建立是教师自我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社会转型过程中教师角色与社会结构之间的耦合不良导致了教师的角色认同危机。

基于以上研究发现和结论，本研究从四个方面提出建议，以重建教师的自我认同。教师个体公共使命的承担，可以使教师从“私事化”的职业生活中走出，实现更丰富的职业价值；教师专业组织的建立可以在保障教师自由自主的同时提升教师的主体意识和专业水准；教育制度伦理的重建可以为教师提供更具人文色彩的职业生活环境，促进教师主体自我价值的实现；社会公众力量的支持可以使教师获得社会生活中的身份感和归属感。总之，通过内在自我主体意识的唤醒和外在组织、制度的保障及社会力量的支持，使教师的自我认同得到重建，使其重获作为师者的荣耀和尊严。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5
第二节 核心概念与文献背景	14
第二章 研究过程	33
第一节 研究方法的选择及使用	37
第二节 研究者的思考及反省	53
第三节 主题浮现与研究思路	65
第三章 “良心活”与“花活儿”	69
第一节 “教师是一种良心活”	74
第二节 当“良心活”遭遇“花活儿”	96
第三节 “框架”的迷失与“自我的他性”	110
本章讨论与小结	117
第四章 “压抑”与“困惑”	121
第一节 学校制度空间中教师的专业生活图景	126

第二节 制度规约与专业自主的冲突	135
第三节 专业认同与专业行为的背离	155
本章讨论与小结	167
第五章 “我”和“我们”	
第一节 作为集体记忆的教师	176
第二节 “去圣化”之后的教师	192
本章讨论与小结	212
结语 生活政治的兴起：教师自我认同的重建	
附录	227
附录一 田野日记节选	229
附录二 开放式访谈节录	233
参考文献	
后记	237
后记	245

第一章
导论

一切自由、一切真理和一切意义都依赖于个人做出并予以实施的选择。

——维克多·弗兰克尔

第一节 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一、问题提出

美国社会学家乔治·瑞泽尔（George Ritzer）认为，“最好的社会学理论经常来自于社会学者个人最切身的议题”^①。我国学者吴康宁教授也认为，“真正的研究应当是研究者的一种生命运动，应当是研究者自身生活史的一种延续”^②。作为一个初入学术之门的“问学者”，研究者与“最好的理论”“真正的研究”也许都相距甚远，但是，研究者却带着真实的生命历程和原始的研究冲动走向本书选题。这个选题的提出，不只是一个单纯的“为研究而研究”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源于自我生命历程中的困惑而叩问内心、关注研究者所属的群体并回应学术的过程。

（一）一个关于教师的梦想

梦想是一种自我生命内在的牵引力量。本书选题源于一个朴实的童年梦想。上小学一年级时，人们问我将来干什么，我稚嫩地回答“当老师”。因为，在一个小女孩的眼里，手执教鞭，站在三尺讲台上的老师，光荣而神圣。那可能是一种丝毫没有理性的懵懵懂懂的回答，却是一个真实的童年梦想。教师在个体生命早期所扮演的特殊角色，使这一职业成为一种极易形成个体梦想图景的特殊职

^① [美] 乔治·瑞泽尔著，杨淑娇译：《当代社会学理论及其古典根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② 吴康宁：《教育研究应研究什么样的“问题”——兼谈“真”问题的判断标准》，《教育研究》2002年第11期。

业。或者说，这一职业内在的权威力量、理想和浪漫的色彩很容易将一种梦想冲动播种在讲台之下的幼小心灵之中。

而让这样一种梦想成为一种职业信念的是在生命历程中与我相遇的老师们，尤其是我中学的历史老师。他的家虽然离学校很近，但是他仍然住在学校里，为的是在中午给带饭走读的学生热饭，在晚上辅导自习。他只教了我两年，但他用自己无限期望的眼神和阳光般温暖的关心让我知道了老师的爱是一种怎样神奇而伟大的力量，知道了老师的爱对于学生意味着什么。我也用自己的默默努力回应他的期望。初二下学期，他突然倒下了，患了严重的脑痴呆。他再也不会用炯炯的眼神、富有磁性的声音和我交流了，可是他已成为我灵魂中永远巍然屹立的雕塑，成为一种永恒的推动我人生向前的力量。就是在那时候，“当老师”便成为一个中学生的职业信念。我真的相信教师职业对每个人的成长具有重要意义，是值得我将生命托付其上的职业。

然而，高考填报志愿时对父母的遵从，使我误入“会计学”的歧途，四年的大学生活毫无方向感，内心有一个声音始终对抗着现实的生活，“我必须回到自己的轨道上”。理想的牵引使我无法向现实妥协，终于在大学的最后一年，我决定考研。三年的研究生学习之后，我本来最想做的是当中学教师，可是我接触到的中学老师描述着他们面对升学考试的压力，他们感觉有一张紧紧的网罩在他们的工作中。我对中学教师的职业生活方式产生了一种恐惧和逃避。我在想，在那样的现实状态下我能做我想做的吗？我能成为我想成为的吗？我对答案产生了质疑。

由于种种现实的原因，我最后进入一所私立大学。参加工作后，出于实际需要，我被分到公共教学部，教授“政治经济学课”。当我拿到课本的时候，首先面对的问题是：“我能按课本讲吗？学生相信我讲的吗？我到底是按课本讲还是按我自己的理解讲？实事求是地讲？”因为，《政治经济学》课本里一些内容已经过时或者已经脱离实际，甚至一些观点和结论与实际情况矛盾、对立。大学生已经基本形成了自己对事物的理解和判断能力，我还能“欺骗”他们吗？我上中学的时候就学过了同样的内容，那时的我都产生了质疑，何况是他们呢？所以，我决定选择实事求是，选择按自己的方式去上课。可是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我虽然尽力保持一种理性的质疑，但在很多问题上我还是回避了。这样一种上课的感觉很不“爽”，不能痛快淋漓，不能达到一种理想的状态。总有一种无形的约束性

力量笼罩在自由的精神之上。莫名的矛盾和苦恼使我很难实现自己所憧憬的教师职业生活。我隐隐地感觉到教师角色所特有的一种规约。我在这这种规约中苦恼，别人又在如何面对和实现作为教师的内在自我？

当我去观摩一位老教师上课的时候，我震惊了。那位老师讲的是《邓小平理论》，他站在讲台上照本宣科，滔滔不绝。讲台下，学生有的睡觉，有的看课外书，有的低声窃语，而他却视而不见。可以看到，在他的观念里“我只要讲课”就行了，而且是“讲教材就行了”，至于他本人对教材的观点，至于学生是否相信和认同都“无所谓”了。在他的教师角色扮演过程中，别人给什么样的面具，给什么样的剧本，他就怎样表演，至于面具背后的自我可以与他的教师角色扮演过程完全剥离。他没有质疑，也就没有矛盾和苦恼。这样一种“自我缺失”的职业生活状态正常吗？在这样的职业生活中教师自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何在？

这种“有我”的矛盾与“无我”的漠然，也许不是我所在学校的特例，很有可能是教师职业中一种普遍存在的样态，而且在中小学老师中也许会更突出一些。因为高校相对于中小学而言并没有紧迫的升学考试压力，自由度相对较大。那么，中小学老师在实际的职业生活中如何面对自我并实现和确证自己作为“教师”的存在意义？作为个体教师的我反思着群体性的存在问题。

（二）一次关于教师的调研

一次关于教师的调研使我对教师的群体性存在状态有了更多的反思。近年来，教师职业道德问题在媒体力量的渲染中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是教师群体的职业道德确实在滑坡还是媒体对教师形象的“妖魔化”？对于这种群体社会形象的危机处境，无论是教育学术界还是一线教师，在很大程度上都处于“失语”状态，难以做出有力的回应。但是，面对问题，我们不可能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里。2006年，我参与了国家级课题“师德现状与师德建设研究”的调研，我试图在现实中寻找教师群体的真实图像。

在访谈中，我听到了老师们对于自己生存状态的表述。在杭州市的四所中学中，有省重点中学，也有职高和基础薄弱中学。虽然老师们所处的具体学校情境不同，但他们对自己的职业生活状态进行了极其相近的描述——“忙”“累”“压力大”“身体累，心更累”，当问及他们是否能体验到当老师的幸福感时，一个老

师说，“我们只有辛苦，没有幸福”。在“紧箍咒”一样的考试制度下，一位女校长激动地说，“老师快把学生逼疯了，校长快把老师逼疯了，而校长自己也在巨大的压力下快受不了了。救救学生更要救救老师、救救校长”。当我听到她的呼告时，我在想，谁可以并且能够施救？用什么施救？为什么会产生教育中的群体性危机和求助状态？是否有一种个体力量之外的强制性力量在规约和压制着教育“铁笼”中的人们？

在对开放性问题的回答中，老师们谈到了他们对师德问题的理解和认识。

我认为绝大多数教师在师德方面的表现是很好的，他们的师德是高尚的，但是媒体对教师的评价太低，他们报道的师德有严重问题的只是个别现象，但却影响了教师的形象和社会地位。^①

由于市场经济的影响，教师与教师之间相互攀比，把金钱放在了第一位。有偿家教现象严重。有的老师甚至在教学工作中不顾自己的教师身份，硬性要求学生上家教，有的则通过间接方式要求学生上家教。这样，他们课堂上不认真教学，课外时间拼命带家教挣钱。有的带家教的收入远远超过了工资收入。^②

在问卷调查部分，当问及“假如让您再选择一次，您还会选择教师职业吗”时，回答“不会”的老师占36.4%，回答“很难说”的占42.8%，只有20.5%的人回答“会”。^③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教师对于职业的认同度较低，他们对自己的职业身份产生了某种程度的认同危机。

为什么会造成教师们如此的职业生存体验，老师们为什么会对自己的所从事的职业产生认同危机？枯燥的数字不能完整地呈现人的内心，短短几十分钟的访谈，也不能够逼近教师职业生活的复杂与真实。对这些问题的深入追问，需要完整地了解教师的生存，了解作为教师的他们如何在职业生活中确认自己的意义和价值，如何建立自我认同感，从而获得身为教师的内在欢乐和尊严。

^①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师德现状与师德建设研究”调查报告。

^② 同上。

^③ 同上。

(三) 一场关于教师的争论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教育的变革，教师自身的角色意识和身份意识开始觉醒，而这种觉醒反映在近年来一场关于教师角色的学术争论之中。2003年，吴康宁教授发表了题为《教师是“社会代表者”吗——作为教师的我的困惑》的文章，一石击水，掀起了一场关于教师身份与角色的争论。在这场讨论中，形成了两种主要的观点：有学者认为教师“必须并且只能是社会代表者”^①，而另一些学者认为教师是“一种悖论性的社会角色”，教师是“半支配阶层代言人半公共知识分子”。^② 在这场争论中，人们触及的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事实上更是关乎每个教师的生存姿态问题。教师是谁？作为教师的我是谁？问题的答案不应也不会终结于学者的学术争论，而是需要每一个教师用自己的现实行动做出注解和回答。

这场讨论从“社会代表者”这样一个社会学概念出发来探讨教师角色问题，而研究者所关心的是，对于选择了这样一种社会角色的个体，他的自我认同与社会的角色期待之间存在怎样的冲突。在具体的教育实践情境中，每一个教师又如何在真实自我与社会角色之间取得平衡？当教师扮演一种工具性或功能性的社会角色时，作为个体的自我如何在现实情境中获得自身存在论意义上的价值？对于这些问题不仅需要应然的争论，更需要实然的解释。

与此同时，可以发现这场讨论主要是由高校教师发起的，在讨论中很少看到中小学教师的参与。那么，中小学教师是否面临同样的困惑，他们在困惑中又如何行动？我们需要探询问题的答案，因为现实的答案意味着教育事实，或者说不同的答案意味着不同的教育事实，而不同的教育事实会造就不同的教师和学生的主体生存状态和存在价值。而要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则需要注视教师生活的真实，聆听中小学教师自己的声音。

无论是基于自我的经验还是对他者的关注，都无法回避一个现实问题——教师在其职业生活中的自我认同问题。换言之，对于这样一个问题的意识和捕捉，既源于研究者作为教师的个体生命体验，也源于研究者作为一个研究者的学术历程和对教育现实的触摸。这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自我之外的研究问题，同时也是

^① 郭兴举：《论教师作为社会代表者——与吴康宁教授商榷》，《教育理论与实践》2003年第1期。

^② 吴康宁：《教师：一种悖论性的社会角色》，《教育研究与实验》2003年第4期。